

皇甫村的三年

柳 青 著



皇甫村的三年

柳 青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作者近三年來在報刊上發表的散文特寫八篇。前七篇都是有關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作者以鮮明的階級感情，簡潔樸實的文筆，反映了陝西渭水南岸一個地區農村生活的深刻變化，尤其是着重地寫出了 1955 年下半年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裡揭露了生活的真實、矛盾和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向新社會主義前進的巨大力量。

最後一篇“蘇聯人民是真正幸福的人”，反映了蘇聯人民積極的工作精神和樸素的生活態度，表現了他們高度的道德水平。

責任編輯 李芝民 責任校對 朱爾娜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條 街 同 四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7 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805 字數 49,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frac{3}{4}$ 插頁 2

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 (6) 0.27 元

目 錄

新事物的誕生	1
灯塔，照耀着我們吧！	7
第一個秋天	26
王家斌	33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44
中國热火朝天	54
王家父子	62
蘇聯人民是真正幸福的人	77

新事物的誕生

——为“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报作

在陕西省渭水南岸一个角落里，挨近一道小河，有一个村庄叫做王莽村。村里有一百五十多户人家。过去两年中，我上那里去过好几次。

我第一次到那儿去是在一九五二年冬天。那时我和县委的工作组一起到这个村上去帮助农民建立全县第一个合作社。

一九五〇年春天，这个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接着组织了互助组。过了两年，农民的觉悟提高了，他们建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的发起人蒲忠智和县委派去的干部一起制订了一个计划，打算先从十四户做起，一年以后扩大到四十户左右，并且再建立两个小社，三年里全村达到百分之八十合作化。

一九五三年，我住在离王莽村三十里路的地方。我经常打听王莽村的消息。起先得到的是令人愉快的消息。蒲忠智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把几条品种不好的公牛

換了強壯的騾子；他們由於使用十吋犁，每畝小麥達到五百四十斤的平均產量，幾乎是普通農戶的一倍，比互助組也要多三分之一。我聽說社里最窮的葉靈娃也還清了債，而且交社六十萬元牲口投資；淨吃小麥，到稻子上場時還吃不完。這樣的事在過去是沒有的。這個例子很生動地說明了合作社的好處。

但後來情況變壞了。社員葉正賢過去是一個富裕中農，這時到處說：入社不如參加互助組，參加互助組不如單干。有幾個社員受了這話的影響，消極起來了。合作社內部不和，結果秋收受到損失。秋收不如夏收了。

秋收過後，社里開了一次社員大會，檢討過去的工作。葉正賢乘機在會上攻擊合作社主任蒲忠智，並且宣佈他要退社。他以為受他竭力煽動的一批社員也都會學他的樣。

但是，這些動搖分子當中就有三個人當場後悔自己沒有好好幹，影響了秋收，白減少了自己的收入。

因為全年的收入分配以後，社員的收入都比上一年多，這影響了那批動搖的社員，最後沒有一個人願意學葉正賢的樣。

冬天，全國展開了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羣眾運動。

這一運動在農村進行的方式就是向農民宣傳組織起來的好處，說服農民把余糧賣給國家。這樣，農民就幫

助了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使富農和商人再不能剝削缺糧的農民。

我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参加了許多次党、团的支部大会、全村鄉干部会、妇女代表会、老人座谈会……。我听了許多農民訴說过去的痛苦。很多人談到將來的幸福生活，眼睛里閃着光。

在我工作的地方，大家淨是談論王莽村已經把余糧賣給國家的事。去过王莽村的人都羨慕地說，王莽村的人不但在廣大原有的合作社，而且还在建立新社。我想起了蒲忠智，也想到我們在合作社建立的第一年一起制訂的那一个三年計劃，于是我就匆匆向王莽村跑去。我到王莽村一見蒲忠智，他容光煥發，喜眯了眼。

我問他計劃執行得怎样了。他回答說：“別說三年，兩年就超过了百分之八十合作化。”我提醒这位主任說，“可別搞冒了。”忠智动着他那說話时顯得很有勁的薄嘴唇說，“今年不同去年，今年人的思想变了。只要人心齐，社务管理压死我也搯！”

蒲忠智說：“柳青同志，我們的社員都不願意讓那些自私自利心重的人入社。但這些農民都跑來找我，很像受了委屈，向我訴苦，并且保證要檢討改正。他們害怕將來入不得社。您想該怎么办呢？难道咱能把人家擋在社門外嗎？我个人認為我們應該吸收他們的。”

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見。我問起叶正賢的近況來。他

告訴我，叶正賢最近躲在家里，几天不出門。当他不得不参加什么會議的时候，他就远远地蹲在角落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叶明义的中農，过去是个动摇分子，現在却公开在会上慶幸自己沒有跟着叶正賢一起退社。并且据說，叶正賢本人也想重新入社。

我建議說，“讓他再入社吧。一个中農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本來是要經過一番周折的。”

蒲忠智說，“可不是。等他申請的时候，我們願意他回來。”

不久以后，我听說王莽村四个生產合作社已合併成一个，以中國共產党誕生的日子命名，叫做“七一联合農業生產合作社”。蒲忠智当选为合作社的主任。我还听說，叶正賢已滿面羞慚地在一次大会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要求重新入社。

最近，我接到到王莽村去的邀請。王莽村的合作社还邀請了周圍各区的許多互助組長。我到了村上，已經有一万多人在那里，他們正在兴奋地研究合作社經營的情况。許多客人拿着筆記本，記下合作社的章程和制度。一位社員站在農具庫里的一具馬拉犁旁边，向客人解釋它的效用。有的客人关心地問合作社小麥的播种和收割時間以及收成的多少。他們也問起施肥和追肥用了多少肥料。在粉房里，我驚奇地看到，參觀的人对这行副業也挺有兴趣。在牲口圈那兒，我又看到農民多么聚

精会神地听一位老年的飼养員談他的工作情况和劳动日的收入多少。在村子的西头，有一位王莽村的農民站在一个大土堆下面向參觀的人解釋，春天合作社拉來二千五百車的土，預备垫在牛圈。在一个廣場边上，一大羣人似乎在打量着好几道牆。到跟前發現原來这些并不是牆，而是堆得高高的土坯，是用來做炕和砌牆的。他們告訴我，已經用去的和堆在廣場边上的土坯总共有十二万五千塊。一听这个数目，許多客人都張大了口。

对于这个村子的生產成就感到驚奇的还不只是那些客人。有些当地居民也同样感到驚奇。我在村子的街上听到一个老人說，这样的事几千年也沒有听說過。

中午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人宣讀了生產合作社社員們給毛澤东主席的信。信里說，村里百分之八十三的農戶已經参加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有余粮。剛解放时，村里只有六十个孩子上学，現在已經有一百三十个孩子上学了。村里也建立了信貸合作，農民不再受高利貸者的盤剝。此外，百分之九十七的農民都参加了供銷合作社。

互助組組長們也都在会上講了話。他們表示要坚决學習“七一”生產合作社的榜样。

会后，農民在村子附近的田野里看斯大林格勒工厂出品的拖拉机表演。当拖拉机拖着犁揚起一片塵土馳过时，人羣中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二十四行播

种机和圓盤耙也参加了表演。

由于观众的要求，这些農業机器表演了好几回。我听到許多農民說：“咱們可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單干戶豆腐干大的土地机器怎能使得开呢！”

“哎！”另一个說。“咱們得加油干，生產更多余粮賣給國家。咱們得自己造机器才成！”

一九五一年我到过苏联。我知道苏联人民是多么关怀中國的一切。我們大家常常說那句已經很普遍的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就是为了爭取这种更幸福的明天，我國的劳动人民正在排除困难，克服障碍，大踏步地沿着共产党指出的道路前進！

- 本文不是作者原稿，是“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报中文版的譯文。作者在字句上略加改动，收在这个集子里。

灯塔，照耀着我們吧！

向農民宣傳總路線和收購糧食的工作結束以後，又參加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社工作，我在鎬河邊上的家里重新定居下來了。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竟有四個月的時光在外面奔跑中過去了。現在，在我住的地方，自然界已經發生了變化。鎬河南岸稻田里的最後一批雁，嗷嗷告別着往北去了；不知在甚么地方過罷冬回來的小鳥，落在庭樹上吱吱唧唧地道好；終南山脫掉了去年深秋就披起的那顯得十分蒼老的雪衣，只剩下山尖上還戴着一頂頂白帽子；而山下一望無邊的麥田放射出春天的翠綠，是人們鋤草的時候了……這正是我去年從縣上搬到這阜甫村來時的景象。

自然界的景象按照季節的更迭年年總是循環着變化，而人世上的變化在我們祖國這個偉大的時代，卻是一年一個樣。我在村外麥田里的小徑上散步，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到處是一長排一長排合作社和互助組的人，在綠茸茸的麥田里鋤草——這邊是男人們，那邊是女人

們，還有男人和女人混在一起的。偶爾有少數單干的人，孤身只影地在田野里悶著頭鋤草，看起來真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怪裂裂的。去年我初到這裡時，只看見有少數互助組夾在遍地亂雜雜的單干的人們中間鋤草，我真想不到今年這時會出現這樣令人鼓舞的景象。

兩個局面，兩種景象——在我國人民奔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我們很難在頭一年想像到第二年的樣子。

記得前年冬天我還在縣上工作的时候，我們幾個人曾到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組織起來的重點王莽村去，幫助他們制訂三年建設計劃。在互助合作方面，我們要求那時剛要建立的蒲忠智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年以後擴大到四十戶左右，並且再新建兩個小社，三年里全村達到百分之八十合作化。我帶著計劃草案回到縣上討論還沒一星期，從王莽村回來的人，就帶來了不愉快的消息。忠智的思想負擔很重，常常夜里睡不著覺；他對他在一年以後要領導一個四十戶左右的社很熬煎，而大家對三年里全村達到百分之八十合作化，信心也不怎麼強。土地加工、新式農具和生產指標都是根據互助合作的發展訂出來的；如果基礎成了問題，這個計劃還能有著什麼用處呢？

“既是這樣，”我問從王莽村回來的人，“他們在討論計劃時為什麼不說呢？”

“咱們講了社會主義的遠景，他們听了都興奮得很：另一方面，他們是全縣的重點，又不願意顯着保

守。可是一看眼前的实际情况，碰到具体问题，心里就沒底了。”

甚么实际情况呢？王莽村周圍是一片分散的小農經濟的大海；甚么具体问题呢？王莽村一般羣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样高。怎么办？工作組只好帮他們修訂計劃，我做檢討，最后向縣委会提議：派一个堅强的同志到王莽村領導党的工作，再以王莽村为中心建立互助網。在縣委会根据这个意見作了決議以后，我就离开縣上了。

我到皇甫村，不相信在这里搞不出个局面。整党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里住过几天。我發現这个在鎬河边上号称十里長的大村子，有一个在減租減息、反霸斗争、土地改革和鎮压反革命运动中顯示过坚强力量的党支部；虽然很多党员有驕傲自滿的情緒或退坡思想，經過整党教育也大体上克服了。我利用晚上的時間，給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積極分子講互助合作課本。鄉干部也領導大家分行政村討論了，大家也認識到新的任务是來了；可是整頓互助組的成績很小。我們曾要求每个行政村組織一个像样的常年互助組做重点，給臨時互助組帶头；他們如果沒有人帶头的話，說起就起，說散就散了；而且总是在夏天活緊正需要互助的时候，散了。但是，我發現我們的要求和事实的距离很远。在七个行政村里只有三个村达到了目的，而且一村搞起不久就散

了，重点組長刘远峯远远地看見我就躲。我追上他，他痛苦地發誓說人心不一，他這輩子再也不鬧這事了。插秧的時節，有一天晚上，我幫助十字村郭远文重点互助組开会解決糾紛，他們說找不到副組長郭远彤。我滿村打听，誰也沒看見他。我到他家里，門上掛着鎖。我用手电棒往里照，他在炕上用被蒙着头睡了。他在多半夜長的会上，除了重复堅決退組的話，再沒吭過一聲。結果這個組退出了兩戶，郭远彤不久搬到三村去住了；到那里，他進了一個寡婦的門。這個在土地改革中分配果實的時候被人稱為大公無私的郭远彤，過他的小日月去了。我沒辦法把這個窮到三十幾歲討不起老婆的生產能手巩固到互助組里，是我去年最難受的事情。

我那时候听到的尽是困难和麻煩。三村的富裕中農郭公平和几戶貧農已經互助過二年，土地复查以后，他覺得再也不害怕誰了，退出互助組拿膠輪車赶脚；互助組缺農具和牲口，只好散了，各想各的辦法。鑄河南岸四村的中農董廷义原來是受過丰產獎勵的互助組長，他从縣上回來把獎狀压在箱底，不給任何人知道。土地复查以后覺得又敢買地了，他就宣佈不當組長了，而且說他的馬有駒，不能給別人下水耕稻地；他地多，現在又只能開工資，沒空給別人做活了。二村的中農董廷傑怕互助組使喚自己的大牛，賣了買小牛。六村的貧農高傳正退出互助組，給富農做活，讓富農的牲口捎種他的

地。四村的民兵隊長董炳漢覺得自己四口人分得七畝半地，又生了兒子，地太少了。他參加不參加互助組是淡事，可是掙死也得再買几畝地；于是改革土地制度才三年，他的地就加了一翻。

自然，这只是我听到的——我听不到的要更多些……

“世事就这样了。那社会主义不知在何年何月……”

“到啥时說啥时的話，人家到社会主义，还把咱給丟下？……”

“哥們先走一步，好了兄弟跟上來。街坊鄰居天天看見，丟不远的……”

这就是我常听到的反映。这就是許許多多困难和麻煩的根子。我也常参加区上和縣上討論互助合作問題的會議。計工算賬的方法、解决做活先后問題的方法、民主管理的方法——应有的方法，方法很重要，有些方法也的确是好，只是到很多村里用处不大。許多人斗地主、捉特务的时候，敢說敢干，有办法；他們就对領導互助組發愁。去年春夏之間，我發現皇甫村有些黨員和積極分子对我似乎疏远了，見了我很冷淡，找不到話說了。有人还故意躲着我走。我很納悶。我把我的思慮告訴鄉政府的同志，看我到这里來又做錯了甚么事，或者說錯了甚么話。果然，他們告訴我有些黨員接受不了我在上互助合作課的时候說過的一段話。我記得我是說

过这样的話：既然我們的國家要到社会主义去，農村黨員就應該參加互助組，積極領導，那麼着他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功勞就更光榮；如果不參加互助組，他們以前的功勞就越來越沒意思了。他們更不能理解这样的话：“如果將來互助組都不要你，黨還能要你嗎？”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四村代表主任高夢生，他一見我就臉紅。直到最後，他終於沒有參加互助組，還並不服氣地對人說：“俺沒明沒黑，風里雨里干了好幾年，難道不參加互助組就連黨員也當不成了？”鄉政府的同志對我解釋，高夢生對一般工作還是照樣積極。

我想起整黨教育只解決了村幹部土地改革以後的退坡思想，社会主义的教育却是抽象的、籠統的。那時我到過的四個區，都沒有拿具體的互助合作問題教育黨員，這皇甫村也是一樣，高夢生的表現就是例子；他可以說出一大攤社会主义的美景，却不知道怎樣才能得到了那個境地。難道這能算已經有了社会主义覺悟嗎？不解決思想問題，計工算賬的方法、解決做活先後問題的方法和民主管理的方法有甚麼用處呢？

我住的地方和王莽村隔著一道神禾塬和一條澗河，有三十里路。可是我經常從縣上打聽王莽村的消息。我得到令人愉快的消息，也得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蒲忠智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使用十吋步犁，小麥每畝達到五百四十斤的平均產量，幾乎是普通農戶的一倍。我聽說社里

最窮的叶灵娃还清了欠債，交社六十萬元牲口投資，淨吃小麥，到稻子上場時還吃不完，怎能不愉快呢？可是不久，我又聽說他的思想起了變化，下稻田撈草的時候，他在家里裝肚疼歇涼。別人叫他，他却說：“入社不入社淡事！”現在，他嫌起農業社束縛他的發展了。他小倆口只分得四畝地，還要生孩子，地太少了；而且社里數他地少，他要出社多買几畝再說。就在这个时候，王莽村有兩戶中農要退出互助組，和農業社比賽產量，村里有兩個互助組要散了。我聽說忠智又要參加緊張的勞動，又要做巩固工作，常常夜里睡不夠覺，很煩躁。我聽到這些，怎能够安心呢？夏收評比中，我去看過他一次，消瘦得很，連剃頭的工夫也沒有。他對我說，人們用鏡框子把土地証裝起來，掛在屋牆上毛主席像下邊，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盤。我給他解釋：土地改革以後，確定土地所有權是黨的政策，這是國家現有的政治制度所規定的，對生產也是有利的；我們要到社會主義去，正是從封建剝削下解放出來的小農經濟基礎上一步一步前進。我鼓勵他熬過農業社的第一年，來年要好辦些。他說他也相信毛主席既然號召到社會主義去，那是一定能到的，只是來自中農和貧農兩方面的自發傾向壓得他掙不住了。我這才更深地理解到我在王莽村第一次訂罷計劃，忠智因對領導四十戶左右的農業社沒信心而睡不着覺的心情。